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出版）

本期目录

【往事非烟】	史铁生和我的文革记忆——《想念史铁生》节选	孙立哲
【不堪回首】	抄家全过程	冯骥才
【千秋功罪】	黄永胜晚年父子问答录	黄 正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往事非烟】

史铁生和我的文革记忆——《想念史铁生》节选

• 孙立哲 •

我和史铁生是清华附中初中同学。同是1951年出生，他1月4日出生，属虎。我1月11日出生，属兔，比铁生差不多小一岁。

我们共同经历了1966开始的文化大革命，1967年初中毕业后，我们于1969年1月13日一起去陕北延安插队，住在延川县清平川的关家庄。他教我针灸给老乡治病。1971年9月，铁生腰疼加重，回北京治病，后来下身瘫痪。我留在乡下继续当“赤脚医生”。1977年，我患肝坏死，住在铁生家养病一年多，朝夕相处，相依为命。1978年，我作为“四人帮流毒”被拉回延安接受批判，铁生亲自替我写检查交待材料，摇着轮椅四处求人援救。最后与作家柳青、画家靳之林、知青杨志群、王立德、邵明路、刘亚岸等上书胡耀邦等领导，递交陕北老乡的“万人折”陈情书，把我“捞”回北京。我继续和他一起住在雍和宫26号小平房里，直到1979年考上首都医科大学外科研究生。随后，他促成我与吴北玲的恋爱，我们终于1981年结婚。我和北玲分别于1981和1982年出国留学。1991年，北玲因晚期癌症，肝、骨等处等发生转移，从美国回京住在中日友好医院，最终脊柱病理性骨折，下身瘫痪。铁生联系方舒等文学艺术界朋友寻医问药找气功大师等设法挽救。北玲于1992年去世后，我正式回国开办公司，铁生帮我给新公司起名字。1997年，我和刘瑞虎带铁生夫妇及几个老同学到美国游玩，开一辆大型房车从洛杉矶到纽约横跨美国十几个州。回国之后，铁生肾功能即告全面衰竭，1998年开始每周三次血液透析。这些年经常约三、五好友找铁生聚会聊天，大多是陕北“插友”和同学、发小。

.....

五

史铁生是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学生，革命者打眼一看，这“型号”就像一株“修正主义的苗子”。文革开始，红卫兵给党员和校长贴大字报。铁生同情校领导，心中不

服，政治逻辑顺理成章：反对党员就是反对党支部，反对党支部就是反对校党委，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就是反革命。史铁生在《小传》中写道：“1966年‘文革’时，我在清华附中上初二，刚刚十五岁。我是职员出身，所以我就站在保校领导这边了。我画了张漫画，一个人，一个耳朵大一个耳朵小，偏听偏信。是贴给外校来支援红卫兵的人看的。韩家鳌（清华附中支部书记兼副校长）把我叫到一边去，特别地鼓励了一番。”铁生哪里想到，世道变了，玉皇大帝龙庭震怒、喝令云雨翻覆，今天是“造反”的时代。“论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红卫兵纲领得到领袖的直接支持，毛泽东一张“炮打司令部”大字报道破天机。红卫兵真有先见之明，揭露出一条“从上至下”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你要接什么阶级的班？每个人必须立场鲜明。铁生默默地“对号入座”，他回忆道：“世界好像变了个样子。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个严肃的结尾，大约都是突然面对了一个严峻的事实，再不能睡一宿觉就把它忘掉，事后你发现，童年不复存在了。”

清华附中红卫兵的造反大字报旗帜鲜明：“……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打得乱乱的，越乱越好！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要这样大反特反，一反到底！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1966年8月1日毛主席给清华附中红卫兵写了信，8月3日，王任重将清华附中红卫兵召至钓鱼台，向其正式传达了毛泽东的信，信中的结语说道：“……我们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

史铁生的世界里突然到处出现血腥。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揪出“黑帮”——为首的万邦儒曾经是我们尊敬的校长。领导和老师原来是要把我们培养成资产阶级接班人，让祖国的红色变色、革命者人头落地、劳动人民再受二茬罪，是可忍，孰不可忍！给男女黑帮们剃的“阴阳头”彰显出他们的反动形象，比电影中的敌人还可恨。“资产阶级当权派”在批斗会上口口声声的认罪，招来革命者一记记耳光和棍棒。

黑帮们被集中关押在五楼大教室内，随时被拉走批判。身体任人损伤，自尊任人羞辱，良知任人宰割，灵魂任人揉搓。革命义愤使革命者丧失人性、走向疯狂；同类相残，花样百出。划清界限最能触及灵魂。附中五楼大教室批斗黑帮，铁生和我都在场。万校长颧骨鼓出来、两颊陷进去、满脸黑胡茬子，和韩家鳌副校长面对面站着，衣衫褴褛。革命者一声怒吼：韩家鳌！抽反党分子万邦儒嘴巴，给我狠狠地抽！韩校长稍一犹豫，脸上重重地挨了一拳。韩校长无奈，一巴掌打到万校长脸上，清脆的一声响。子弹射中子弹，良心刺中良心！亲情与人性已经一文不值。打得太轻！是不是同情反党分子，划不清界限？！

同学们的厉声质问掷地有声。椅子摔在地上变成木棍，木棍打在身上，发出沉闷的噗噗声，哀嚎阵阵钻入我的皮肉，犹如周身叮满噬血的蚂蝗，手指把手心攥出湿汗。心想，革命者的爱憎分明，思想觉悟就是高！后来知道，这打人的不完全都是红卫兵，不乏那些在红卫兵造反精神引领下，用别人的血肉和痛苦证实自己是革命者的同学们。这事可怕，革命激情是一种威力无比的传染病。学校成了从理性中剥走爱愿的试验场；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社会成了凝炼仇恨的蒸馏炉。相比之下，我们怎么恨不起来？这是因为我们还有思想，还有同情心，同情敌人就是对革命最大的犯罪，有思想的战士是最危险的战士。

讲台上的红袖章飞舞，划出崭新的历史逻辑。五四运动以后的几十年里，特别是建党以来，在革命的大风大浪只有伟大领袖高瞻远瞩产生思想，毛泽东思想洞察秋毫，已经替我们把一切都思考好了。天下只有一宗信仰，一个放之四海的真理。领袖挥手我前进，忠不忠看行动！忠诚领袖是衡量革命者的唯一标准。

万校长的儿子万军比我小三岁，是我招蜻蜓粘知了的跟班，红卫兵逼他用皮带抽打父亲，善良拷打善良。他扬起手，闭着眼睛抽过去，革命义愤战胜资产阶级亲情。万校长的小儿子叫万方，方字是万字多一点，我们都叫他“疙瘩”，六七岁的年纪纯真可爱，不但是父母的宝贝，也是我们居民楼中的宠儿。在楼前的批判会上，母亲带着他高高举起拳头，唧唧呀呀的童音喊出：打到万邦儒！消灭幼儿的天真，赎抵父辈的“罪行”。“打倒”的口号声振聋发聩。革命是烈火，是熔炉。年轻人有的是肾上腺素，用肾上腺统帅行动激情无限。我们必须横扫一切资产阶级同情心，把同情踩成粪土，把心肠炼成铁石。造反靠盲从！

铁生和我回忆起附中一位自杀的老师。红色恐怖吓坏了站在“黑帮”边上的青年教师刘树华，瘦小的身体瑟瑟发抖。刘树华不是当权派，只是大学毕业好几年的物理教师、校团委副书记，兼任郑光召所在班的班主任。他是被刚刚揪出来的“反革命”、“坏分子”。什么罪行？——是和大学图书馆的人员关系“暧昧”，也有说是未能成功的初恋情人写来了信，揭发刘树华曾经“纠缠”她。总之，万恶淫为首。《太上感应篇》说得分明。“男女关系”是性激素的专业，其中有无限的想象空间。刘树华小小的身躯哪里禁得住青春小子们睾丸素的喷发？胳膊抡起来，板凳砸下去，一阵阵暴打，使他从讲台左边滚到右边，右边的战士连踢带打，又爬回左边，衣衫被血迹揉搓成碎片，样子像一条癞皮狗。惨叫声声，响应出多少红卫兵和革命者的造反气概、英雄豪情。别装死，站起来，老实交代，到底是怎么耍流氓的？！在撕扯耳鼓的口号声中，刘树华挣扎着站起来，头深埋下去。长长的软发被汗水洗成一条条粗绺垂在眼前，惊恐无助的目光在头发形成的帘布中偶尔闪出。纯粹是《红岩》中叛徒甫志高的形象！革命真是一种强大的非典病，我胸中热血奔腾，拳头捏起来，恨不得也上去打呀！让我们再一次高声朗诵毛主席的指示吧：“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多么激动人心的殷殷嘱托呀！

二十年之后，我们才知道这段唱红天下的毛主席语录竟然是编造的！编造传播“最高指示”，这是什么罪？当时居然无人出来辟谣？岂非滑天下之大稽？！史铁生回忆道：“史无前例的事太多，听也听不过来，想也想不过来。不断地把人打倒，人倒不断地明白了许多事情。打人也是为革命，骂人也是为革命，光吃不干也是为革命，横行霸道、仗势欺人、乃至行凶放火也是为革命。只要说是为革命，干什么就都有理。理随即也就不值钱。”

革命者虽然仇恨无边，体力毕竟有限，身体是本钱，先吃饱饭以利再战吧。台上一声命令：刘树华，明天一大早就过来，听见没有！接着喝问：知道明天来干什么吗？刘树华鸡啄米一样点头，他知道明天的屈辱必然更深更重。威慑是悬在头上的利剑，制造不确定性是用心理实现谋杀。挨打当晚，刘树华带着满身血污把身体拖回到宿舍，神情显得异常镇定。刘树华同一间宿舍的室友是附中张亦鸣老师，未婚妻正好是给铁生和我所在两个班教数学的邵老师。张老师见刘树华一言不发、默默地清理伤口，小心翼翼地轻声劝他想开点，随后睡下。一夜无事。第二天大亮，张老师起床好一会儿了，见刘树华还蒙着头向里侧身睡着，过去推推他，手指感觉异样，心中不由得一惊。原来刘树华为了怕被室友发现，在离开宿舍前用衣服杂物把被褥裹出一个卧倒的人形。此时此刻，其人其命早已魂飞魄散不在人世了。

第二天，即1966年8月27号晚上，我去公寓食堂打饭时，看见家属区供热锅炉下聚集了一大群人，众人仰望天空，用眼睛丈量足有十几层楼高的烟囱。在夜深人静时，刘树华顺着钢丝脚手梯，一步一步爬上顶端，跳入烟囱口自杀身亡。锅炉工用铁钩子把尸体从炉灰中拉出来，刘树华的大腿骨从骨盆脱臼，向上贯穿腹部，牢牢地插进胸腔。显然是从高空自由落体触地的一霎那，由巨大的冲力造成。平时，刘老师给学生讲授物理的自由落体原理深入浅出，今天正是这重力加速度带着他命归黄泉。刘树华老师时年26岁，生命之树正长

得茂盛。试想，谁没有父母？谁没有亲人？难以想象，远在农村的父母如何能接受这可怕的事实？设若他们得知，带着一家人的希望与骄傲，正在城里“有出息的”儿子曾遭受了何等的屈辱，最终以无言的壮烈保卫人格的尊严，一横心，贯身跳入擎接苍天的烟囱口，心里会是怎样的痛楚！刘树华死前想到了什么？心里会不会想到父母和妻子，想起那报不尽的养育之恩和割不断的血肉亲情？在跳入黑洞洞烟囱口前的一霎那，他必定是咬住牙在心里给父母道一声珍重、对亲人说一声对不起，把祈盼交给来世。刘树华是个来自农村的本分人，人穷志不穷。铁生向我说起在陕北学下的话：这人跟人就差得这么多？白馍馍有气，黑馍馍也有气哩！这个事例不过是当时的冰山一角。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死人算什么？中国人有的是，死他个三亿，还剩下一大半哪！

在这红彤彤的新时代中，人性被揉烂，价值被绞碎，人心在触及灵魂的烈火中爆炒后再自己咽下去，化作粪土。

六

铁生跟着几个激进的同学到清华照澜院抄老右派钱伟长的家。史铁生在《文革记愧》中写到他的彷徨与无奈：“我在学校里也想参加红卫兵，可是我出身不是红五类，不行。我跟着几个红五类的同学去抄过一个老教授的家，只是把几个花瓶给摔碎，没别的可抄。后来有个同学提议给老教授把头发剪成羊头。剪没剪我就知道了，来了几个高中同学，把非红五类出身的人全从抄家队伍中清除出去了。我和另几个被清除出来的同学在街上惶然地走着，走进食品店买了几颗话梅吃，然后各自回家。”

铁生正视事实和历史，诚实反思，这是一例。钱家住照澜院16号，与我姨妈马向春的家（照澜院15号）是老邻居，女儿钱开来和钱歌放与我的表姐郑嘉名、郑沈名、郑燕名是一起玩儿大的发小和同学，小时候聚在一起，在钱家的院子里和厢房里撒花、跳高，把好婆（奶奶，钱伟长母亲）和老娘（姥姥，孔祥瑛母亲）气得没辙。钱伟长的夫人是孔祥瑛，清华附中原来的校长。孔老师的父亲孔繁霖是孔子第七十四代孙，仁学传承深厚，三十年代就读于天津南开女中，有名的才女。1934年考取清华大学文学院，师从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等，连年拿甲等奖学金，并担任清华大学校刊《清华周刊》文艺部编辑。1939年毕业后，二十四岁的孔祥瑛与二十七岁的钱伟长在昆明结婚。一年多以后，收到国学大师陈寅恪的研究生录取通知，激动不已。陈先生招学生要求苛刻，这个学术进阶的机会千载难逢。孔祥瑛望着襁褓中的儿子钱元凯，想着只身一人在北美求学的丈夫，婉辞了这个机会，否则很可能成为一代女国学专家。1946年，与读完博士归国的钱伟长搬到清华。建国后，钱伟长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副校长，夫人担任清华附中校长，各自的事业有声有色。1957年，钱伟长因为在1956年发表的一篇两千来字的小文章——《过严地管教青年是封建教育思想的反映》，被直接划为右派分子。到底什么是右派言论引起毛泽东的亲自关注呢？当下的人们也许早已被历史隔膜。下面抄录几段：“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残留下来的封建教育思想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封建社会对青年的‘教育’有一整套，现在我们虽然已经不用那一套‘老成持重’、‘温文典雅’的字眼，但是这些字眼的某些内容却在‘服从’、‘虚心听取群众意见’等另外一套字眼内借尸回魂了，有许多对青年的不合理的要求，就是借助于‘服从祖国需要’这样的光辉的字眼里混了进来，新名词混进了旧内容，确实迷惑了不少青年。”“约束和管教太多，终究是和发挥青年积极性和创造性的要求不相符合的。”“我也曾看见过活泼的青年渐渐地变成沉默寡言，青年们自小在一起的好朋友因为怕被检查搞‘小圈子’而渐渐疏远了，正当的生活爱好和业务特长受到了限制，一切好像都有顾虑，甚至像吃根冰棍都可以算做生活浪费。这样动辄得咎的生活，显然只会伤害他们的锐气，是无益于青年的教育的。”“批评和自我批评在主要的原则性问题上友爱地进行是有好处的，如果是为了‘批评’而‘批评’，没有‘对象’找‘对象’，则会产生消极的作用。在目

前，这样代表着友好和关心的字眼，像‘帮助’和‘批评’，都变成了‘管教’的代名词，实在指出了我们的封建残余是根深蒂固的。”“在学生升学的问题上……在不少地方……硬性地去过多地限制了学生的志愿。有一位爱好农业而具有一定基础农业生物知识的青年，在今年偏偏把他‘动员’到师范学院去了，而且限制在只能进某某省的师范学院，才算是‘服从了祖国的需要’。”“大学毕业以后，学非所用的人也不在少数。如有意见就给你扣上大帽子。我们强调了服从需要，很少照顾到个人的志愿和专业的培养，使青年在这些问题上受到了不应有的过多的限制。积极为这些问题提出意见的青年，总是被认为落后分子。”“总之，对青年的清规戒律是太多了，管得太紧太厉害了。我们反掉了自由主义，而让封建主义的残余从后门钻了进来。清规戒律就是不相信革命群众的积极性，就是封建社会教育思想的残余。”

于是，钱伟长成为“右派”，一夜之间天地翻覆，职务被一撸到底，夫人孔祥瑛受到株连，被免去清华附中校长职务。他们的孩子从此不能再上大学。尽管儿子钱元凯1958年高考分数超过清华录取线五十多分，怎奈家中“出身”不济，只好自食体力，去工厂当了装卸工。

.....

铁生随着大流儿去抄钱家之前，红卫兵轮流去抄过多次，照澜院16号早已家徒四壁。孔祥瑛是个现成的阶级敌人，“老当权派”、“右派老婆”、“历史反革命”，头衔内涵包罗万象，造反派上纲上线随心所欲。孔老师被附中学生剃成“阴阳头”游街，任人辱骂。批斗时，造反派的质问直指要害：为什么明知丈夫是反动右派却坚决不离婚？是不是准备两个人抱着花岗岩脑袋一起见上帝？！随后，钱伟长的右派脑袋上又被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十几年来一家人的灾难如波如浪，奔涌而至。女儿钱歌放回忆：“母亲告诉我们，她被关在（清华附中）理化实验室的小屋，勒令她写交代材料：承认散发反动标语，是反革命；揭发校领导；母亲自知此次凶多吉少，不知是否还能活着回家，就清清楚楚讲述了病句之事的原委，明确重申绝无反党之心，与校领导也只是工作上的来往，绝无包庇之事。母亲详详细细讲述她在学校的工作，全部是按上级领导的指示行事。整整写了两夜一日，未曾停笔，耳边响着受刑者的惨叫声，母亲要紧紧抓住这最后机会为自己申辩。造反派拿着厚厚的这一大叠，破口大骂：X他妈，什么都不认！拉出去给点厉害，看她认不认！母亲被推进行刑室，按倒，蒙住眼就开打，母亲咬紧牙关，一声不吭，连呻吟也没有。母亲说就是打死也不能认。开始还在心中默默数数，还知道又换了打手，后来，就只记得一次次地被水泼醒，后来，迷迷糊糊听到有人说不能再打了，会出人命的。苏醒后只见嘴边一杯水，黑油腻的破玻璃杯上还沾着血手指印，母亲嫌脏，没沾一口。‘他妈的，这老东西还真他妈死硬，记住，今天饶你一命，敢出去说，就别嫌我们不客气！去！滚蛋！’”“回到家，掀起衣服，只见母亲腰部以下完全是黑紫色的，母亲脸上豆大的汗珠如雨，必须去医院。背着母亲，我才发觉，刚两天，母亲轻得就像一页纸。”

铁生在文章中反省他心中的纠结：“但我不解的是，为什么那么多和我站在一边的人，在一夜之间，马上就转到红卫兵那一边去了？怎么忽然就说校领导是修正主义的？工作组一进校，我就蒙了。”

躬身自省，在主义和革命使命的名义下，谁有选择的余地呢？在这大潮中最可怕的现象之一是个体无意识和集体跟风，学名“羊群现象”。环望四周，每个人心中的撒旦纷纷飞出魔瓶。难道果真人性恶，每个人心中都藏着魔鬼？

我给铁生“交代”了我在文革中的劣迹。与铁生相比，我的“造反精神”彻底得多。我出身“高知”，学校轮不上我表现，但是革命是毛主席给我的权力，哪能无所作为？我回到“教授楼”实施革命行动。

一次“破四旧”行动中，17公寓楼后燃起一堆大火，全楼的人纷纷把家中的“四旧”拿出来投到火中，有线状的古书和卷轴画，还有领带、西装、丝头巾。我的父亲拿出美国带回来的几十张古典交响乐唱片，这是他珍藏的宝贝，小心地从封套中抽出来，再仔细端看一遍英文的曲名，一闭眼，猛地砸在桌沿上，一声爆裂的脆响，再弯下腰把碎片捡进一个大脸盆里。我端着脸盆，像是缴获了战利品，跑出去丢在火中。碎片瘫软在火焰里，随即翻卷，放出一股股胶皮味道，令我想起粘知了用的半透明胶。母亲踩着凳子，从壁柜最顶部纵深处拿出一摞摞的英文书，啊？这隐秘的地方还藏着东西，我怎么从来不知道？原来是我姐姐读医学院时的妇产科教科书，硬质的精装封面包着亮面铜版纸，随手翻开，尽是女性裸体细部。母亲说不要看，快烧掉！这些书在熊熊的火中像一块块硬砖头，封面慢慢打起褶，“砖头”边上窜出黑烟，特别耐烧。我们一群孩子有的来回奔跑运输燃料，有的拿着树枝围着火堆转，不时近前去拨动其中的燃烧物，被烟熏了眼睛又跑开去。“破四旧”真好，革命的烈火烧毁旧世界，迎来无限光明的未来。我们这群孩子心潮涌动，这简直是史无前例的节日。

“是谁在烧东西？！是不是在烧毁罪证？！”一群戴着红袖章的清华大学红卫兵飞快地跑过来，面孔在火光映照下变了形，喘出的粗气里喷出革命义愤，“赶快把火灭掉！”一个红卫兵，像是领导模样，夺下我的棍子，扒拉着尚未烧尽的图书，高声喝道：“怎么都是些孩子，谁指使你们烧的，大人呢？都给我出来！”我恍然大悟，革命警惕性太低了。“是我妈让烧的！”我带头揭发，毕竟是清华附中出身，立场鲜明。飞跑回家把我的母亲强拉出来，她脸上的肌肉颤抖，小心地解释这只是医学书。“医学书为什么烧？！”革命者头脑中的逻辑清晰，我的母亲理屈词穷。“留下姓各单位，听候处理！”红卫兵的话如法官宣判。

从这一天起，我母亲的脸上落下了抽搐的病根。后来又发展为迎风流泪，成了史铁生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法学教授及其夫人》的原型。这是后话。

八

给史铁生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郑光召等学生挨打的情景。

那是1966年8月份，全国“血统论”甚嚣尘上。打下江山当然是为了坐江山，哪有为别人打江山的道理？用出身划分阶级阵营，建设纯洁的革命队伍，确保大好江山代代相传，天经地义。清华附中每个班里都发现了“反动学生”——这些天生血管里就流着反革命污血的“黑五类”子女。铁生班里发现了两个女生出身“反动”，名叫王淑英和孙淑绮，史铁生眼看她们被剃了阴阳头、挨皮带抽打。我们班挖出的是一位女生和一位男生。女生是年级短跑冠军，家中贫困，平时衣着朴素，虽然学生注册表成分一栏填的是“城市贫民”，经考察，祖父是从农村跑到城里来的漏网地主，她撒谎，欺骗了组织。男生令我惊讶，功课一流，是我的心中偶像。文笔好，嗓音带有磁性，造反开始时当了班文革组长，带领我们写大字报，对资产阶级口诛笔伐。班里同学揭发他隐瞒了成分，父亲是个大“右派”，发表过一千多万字的文章向社会放毒，全是封、资、修货色。更为严重的是，有人揭发，在城里看见他和高中女生肩并肩一起走路，这女生比他大三岁，还偷偷拉手！现在这一对男女同时不在校，有意逃避批判。同学们警惕呀，这是一个伪装革命混进造反队伍里的“狗崽子”，反动分子就睡在我们身边！那个年代，男女学生谁敢私下发展男女私情，发生身体接触？男女界限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分水岭，革命的纯洁性哪里去了？！此时，刘树华已经被揪出来

了，前车不远。这男女“拉手”事件，居然在我们班的同学里发生，不啻是一颗精神原子弹在我的胸中爆炸。心内暗自庆幸，好在没人揭发我和史铁生在莫宗江家偷看裸体画。

8月26号上午，各个班级的“红五类”不约而同地开始殴打出身不好的同学，让其知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过了中午，十来个“反动学生”，像畜生一样被分批驱赶到了大操场上。铁生和我都随着大批同学出去“接受教育”。我俩出身“职员”和“高知”，各自底气不足，感觉处在距离“黑五类”不足五十步的边缘地带，处境岌岌可危，革命活动不敢缺席。只见“反动学生”们散落在大操场各处，撅着屁股，跪在地上拔草。三三五五围观的同学走走停停，像是北京动物园中的游客。我们随着一片叫骂声，走到大操场中央靠东的一群人中。郑狗！你也有今天！一阵乱脚踢上去，一团壮硕的身体跪在长着杂草的土地上，东倒西歪，胸腔内发出“吭吭”的回声。是郑光召！我心里说。他是清华附中高三学生，“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顶尖人物，除了功课好，还是铅球和短跑冠军，我们背后叫他“郑大块儿”。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此人居然还是文艺能手，文章写得漂亮，能导演，会编剧，是全校文艺汇演节目的总编导。铁生佩服郑光召，这名字常挂在嘴上，用今天的话说是铁杆“粉丝”。平时在学校里，郑光召走到哪里，身上不但经常聚起姑娘、小子们故作不经意投来的目光，更不时触发青年人大脑沟回下意识的电子撞击、还有神经介质和体内激素的超常分泌，思想和欲望历来在潜意识中穿行：好奇、激动、幻想、喜爱、钦佩、崇拜、嫉妒、不屑、仇视、憎恨……优秀的人逼你暗中做出比较、秘密地审看自我和发现自我的欲望。

世界复杂，人心不古。也许真是应了三国魏人李康《运命论》里的古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郑光召上午已经在教室被连续教育了好几个小时，棍打脚踢。如今单衣上浸出数条血迹，背上好几处撕开不规则的裂口。头上的汗流出来清晰可见，淌在地上，渗进被烈日晒熟了的热土里，化为无形。崇拜是获取权力的先声，革命需要打碎旧的崇拜，建立新的标杆。这时，人群中闯进来三个女生，一水儿的黄军装、黄军鞋，腰中紧紧扎着武装带，粗大的金属扣在太阳下闪出幽暗的光泽，两个梳着“刷子”小辫，另一个戴着军帽。一个女孩儿解下武装带，袖子挽起来露出半段上臂，两腿劈开，身体成一个大大的“人”字形，将武装带高高扬起，把铜头狠命抡向下面的身体——只见郑光召身体猛地抽动了一下，随着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跪着的身体翻向侧面，周身饱满的肌肉痉挛大抖，面孔像是滚油里的煎鸡蛋，暴起皱褶，眼珠凸出一网血丝。换了一个女生，抡起武装带再次左右开弓，前胸起伏，气喘吁吁。郑光召的衬衣上，被太阳晒黑的条条旧血污上又添出几片殷红，像彩色墨笔在宣纸上写意出的几枝腊梅，黑褐色的是骨，亮红色的是花。抽累了，一仰头，脸上的热汗甩出一串漂亮的弧线。显然，郑光召扭动身体的样子和狼嚎般的叫音，使打人的女生产生巨大快感，她们互相交换眼神，上下嘴唇拧出怪笑，扬长而去。铁生和我多次提起这个场景，他相信法西斯主义不是德国人的专利，如果没有爱和法律，每个人都可能变成法西斯。史铁生和郑光召后来成了终生的心灵之友。

.....

郑光召东面不远的地方跪着一个女生，边上不少同学围观。最先看到这女孩儿的双腿，一双塑料凉鞋，脚上很多泥土，一边拔草一边向前爬动，爬行时塑料鞋条带下方偶尔会露出一条条白嫩的皮肤本色。小腿露在外面，上面有泥土污秽，记得是穿一件黑色裙子——今天的记忆里不敢确定。上身一件浅色的翻领衫，满身泥污显然被汗水渗进棉织物的纤维里，又被太阳晒得皱皱巴巴，腰部有一段皮肉露在外面。她低着头，一侧小辫的束扎皮筋脱失，颇长的长发散乱，垂在一侧，遮了半张脸；另一侧小辫上的皮筋向下移位，皮筋上部的头发蓬松出几个鼓包。几个女生走过来，其中一个在女孩儿腰臀部猛踢几脚，每踢一脚，女孩儿身体向前方冲一下，随后缩回来，没趴倒。打人者又绕到她的前方，向下啪啪几巴掌打在头

上，边打边喊，我让你不老实！我让你不老实！随后，左手抓住长发，突然向上后方一提。我看见一张沾着泥污的脸，从年龄判断是高中生，不认识，长得样子也完全不记得了，只记得她的脸歪向一侧，眼皮不断地眨。打人者右手甩起来，几个耳光，打在左脸的同一个位置，准确而响亮，脸上鼓胀起不规则的手印，鼓起的皮肤团块是青白色的。打人者把抓住的头再向下一甩，满怀骄傲地大声对同伴说，今天让她知道知道厉害！这话显然也是说给我们这些观众听的。随后晃着身子走出人圈。女孩儿至此一声未吭，默默忍受。又有一个女生过来，手里拿着一根青绿色的新鲜树枝，显然侧枝刚被撕折，部分树皮剥脱，有弹性，像根鞭子。走到跪着的人形后面，猛地向后背抽了一鞭，女孩右肩反射性地抬了起来，反手又是一鞭，女孩儿左肩又抬了起来，连续抽了两、三个来回，女孩的头向后仰，脸朝着了天空，整个背部向后方反弓起来，等待着下面的抽打，形成一种奇特的姿势。多年以后学了医，我才知道这种姿势的学名叫做“角弓反张”，是中枢神经系统处在危机状态极度紧张时才出现的病理姿势。打人者走了，女孩儿终于小声地戚戚哭了出来，肩膀剧烈地抽动，继续向前爬，抓住一把草，猛地拽出来，带出一团泥土。我的周身发紧，关节僵硬，纯粹生理反应，却故作镇定，心中有一种意志强大无比：坚决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围观的人表情漠然，似乎已经司空见惯，抑或和我一样，不敢让人家看出内心的“活思想”？一顿暴打告一段落，我们随着人流挪步，像是要赶场看下一场表演。

女儿孙婕莹，铁生的小粉丝，16岁。听了这段故事，无法想象和她同岁的花季女生，在46年前会跪在地下任同学随意殴打，她问我：“为什么？”

如果人有终生记忆的话，这算是一个不能忘却的终生记忆。我和铁生回忆的时候，都清楚地记得住场景，但是一点都说不出她的面孔。我们至今不知道这位女同学的名字，也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出身。我自认为记性好，比如我能复盘几十年以前下的一盘围棋。但是今天写这个回忆的时候，头脑混沌，记忆像一阵风。好几次眼前竟然跳出16岁的女儿婕莹。这女儿是个优秀学生，会拉琴，会跳芭蕾舞，经常给老爸出难题，让我给她摘星星、摘月亮。

史铁生与“黑五类”只隔着一张薄纸，纸的另一面是眼前地狱般的世界，只等着一条消息把这张纸捅破。史铁生的爷爷是地主，在河北涿州乡下曾经远近闻名，后来在战乱中败落。铁生在《奶奶的星星》里写道：“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奶奶又戴上了一顶‘帽子’，不叫地主，叫‘摘帽地主’”。其实和地主一样，占黑五类之首。所不同的是，“摘帽地主”更狡猾些；一个地主，竟然能够“摘帽”，显见其伪装是何等的高明，其用心是可等的险恶，对社会主义的威胁是何等的不可低估。而且这也成了“刘邓路线”的罪行之一。”更可怕的是，铁生的姥爷是个解放后镇反运动中被枪毙的“反革命”。被无产阶级镇压，这可是板上钉钉的“血仇”。铁生知道，与班里挖出来的“黑五类”和这些挨打的“反动学生”相比，他血统中的颜色也许更“黑”。命运正对着史铁生窃笑：去吧，跪在地里等着挨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铁生从来没有见过姥爷，其生命和尸骨早已灰飞烟灭，化在宇宙的无垠之中，虚无缥缈。铁生写道：“但这虚缈并不是无。就象风，风是什么样子？是树的摇动，云的变幻，帽子被刮跑了，或者眼睛让尘沙迷住……因而，姥爷一直都在。任何事物都因言说而在，不过言说也可以是沉默。那人形的空白中常常就是母亲的沉默，是她躲闪的目光和言谈中的警惕，是奶奶救援似的打岔，或者无奈中父亲的谎言。那人形的空白里必定藏着危险，否则为什么它一出现大家就都变得犹豫，沉闷，甚至惊慌？那危险，莫名但是确凿，童年也已感到了它的威胁，所以我从不多问，听凭童年在那样一种风中长大成中国人的成熟。”

人类是群居动物，生活在不同的社会规则中。有的社会，你是你自己，你用未来塑造自我；有的社会，你是别人，你必须生活在过去。好像运动会上比赛跨栏，有人盯住前方的目标，腿下狂奔，有人却不得不一步三回头。这后者怎么能跑得快，怎么能不摔跤？文革开

始，历史走出尘封的案卷和无奈的记忆，被重新赋予生命，卷土重来。时间向量突然逆转箭头，和宇宙规则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裹挟着人定胜天的强大意志，带领人民返回未来，走向宇宙大爆炸的“原罪”。被枪毙的姥爷突然从坟墓中站了起来，走入史铁生的生活。铁生记录了母亲的讲述：“那是我刚刚迈进十五岁的时候，早春的一个午后，母亲说：“太阳多好呀，咱们干吗不出去走走？有件事我想得跟你说了。”母亲这么说的时候我已经猜到，那危险终于要露面了。满天的杨花垂垂挂挂，随风摇荡，果然，在那明媚的阳光中传来了那一声枪响。那枪声沉闷之极。整个谈话的过程中，“姥爷”一词从不出现，母亲只说“他”，不用解释我听得懂那是指谁。我不问，只是听。或者其实连听也没听，那枪声隐匿多年终于传进这个下午，懵懵懂懂我知道了童年已不可挽留。童年，在这一时刻漂流进一种叫作“历史”的东西里去了，永不复返。”

铁生的姥爷早死了，但是奶奶还活着，让人家盯上，顺藤摸瓜，“黑五类”出身的消息难免走漏。再说，城里天天有抄家和游街的事，世道凶险。怕是早晚纸包不住火。在铁生母亲的精心策划下，铁生奶奶主动“自我遣返”，回了原籍——河北涿州的农村。铁生在文章中记录了这个过程：“妈妈让我回学校去住。我上中学的时候住校。妈妈说：“这一阵子先不要回家，有什么事我去找你。”妈妈给了我三十块钱，六十斤粮票，看来够两个月的伙食费了。“一天，妈妈到学校来找我，对我说，要是想回家就到她的单位去，她在那儿找了一间房；奶奶已经回老家了。……我倒是松了一口气。那些天听说了好几起打死人的事了。不过坦白地说，我松了一口气的原因还有一个：奶奶不在了，别人也许就不会知道我是跟着奶奶长大的了。我生怕班里的红卫兵知道了这一点，算我是地主出身。”铁生有家不能回，成了半个孤儿，越来越多的时间和我们这群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厮混在一起，经常出没在清华大学的校园里，出没于我们“教授楼”。我们一起看大字报，一起听批判会和辩论会，一起朦胧，一起迷茫，一起偷书，一起“逍遥”。老天爷长眼，多亏母亲的前瞻性安排，史铁生躲过一劫。

九

铁生说文革颠覆了整个社会的道德观，改变了几乎每个人的生命轨迹，也培养了许多畸形儿。

一叶知秋。我和史铁生谈到清华发小吴文北曲折命运和可悲结局。他六岁随父母从法国来中国并加入中国籍以后，在家里和法裔母亲一律说法语，发音字正腔圆，绝对唬倒外语学院二把刀教授。他熟悉法国历史，看过大量法文文学名著，还能说出来西贡的法文和巴黎的法文在发音和用法上有什么不同（越南曾经是法国殖民地），学问不浅。科学院数学所搬离清华后，吴文北随父母搬到中关村科学院宿舍。

大约1968年初的一天，小悦来我家说，你看谁来了。吴文北从身后冒出来，傻乎乎的笑，小时候脸上的雀斑被高矮不同的一排排壮疙瘩代替。之后我们几个发小隔几周见一面，交换各种见闻，海阔天空。在我的请求下，文北还专门来家教过我几次法文。那时，华侨饭店、友谊商店等专门对外国人或拥有外国护照的华侨开放，国人不许入内，神秘非常。门外有持枪的卫士站岗，进门有保安检查证件。这位老兄不服，法兰西雅各宾党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血中沉渣泛起，脸上青春痘涨起来，大嘴一咧，都是人，凭什么偏不让咱进？！回家自己照镜子，满脸青胡茬子，长相也像老外。于是，穿戴上父亲从法国带回来的一双老皮鞋、一件皮夹克和一顶鸭嘴帽出门。到了华侨饭店，见了门卫假装不懂中国话，满嘴往外秃噜法文，把装成仆人跟着提包的弟弟吴文中训得狗血喷头。察颜观色是门卫倚赖的根本饭碗，平常有领导以身作则，无师自通。一看这主儿路子够野，在外国也绝不是一般干部，没

敢要证件，赶紧恭敬放行。他出来到我家，给我和小悦等几个朋友大侃在里面见到的珍稀商品，香肠美酒外国巧克力，口沫横飞，两只蓝眼珠瞪得溜圆。我听得过瘾，心中羡慕。

吴文北腹中馋虫造反、饥渴难耐，无奈袋中羞涩只有眼福。家中将近十口人，吃饭主要靠父亲一人工资，哪有闲钱给他花？口中骂骂咧咧：想当初，我妈要不是为了我爸的什么瞎编的爱国理想，才不会把我们从小巴黎带到中国这种鬼地方受罪，狗都不会来。口无遮拦。我和小悦的政治觉悟早就武装到了牙齿，忙说，赶紧打住，这话可别再说啦，被人家听了去，说你污蔑红色政权，打成现行反革命不跟你商量。铁生大有感触地说，是呀，权力和流血最能教育人，文革以来，无数人祸从口出，“因言获罪”，满世界假话真说，真话不说，想活命的人都跟着时潮学嘴。瞎话重复一百次就成真理，大大超越戈培尔为希特勒造势、谎话说一千次成为真理的历史记录。有的话一说出来，天生就是真理，更有的话一句顶一万句。会简单乘法的人，写文章开篇就先来几万句真理，安全高效，哪管真话、假话、言不由衷？！我接着给铁生讲：还别说，一次偶然事件，吴文北真和红色政权结下了梁子！我哥立博熟悉内情。

吴文北一次坐火车外出，几天没洗脸，加上他那个洋人长相，没招谁没惹谁，在天津火车站被便衣警察当新疆盲流盯上了。车站里的告示贴得漫天满地，坚决打击盲流，没有本城户口不许进城。少数民族不好好在新疆呆着，乱串什么，是不是到大城市来偷东西，扰乱社会治安？两个便衣二话不说抓住他的胳膊就往回拧。哪知吴文北力大无比，双膀一较力，两个便衣被扔出去摔倒在地。警察握有国家权力，谁见谁怕，哪里吃过这个亏？招来十来个大汉一拥而上把文北按倒，拷上手铐。带到拘留所，不容分说拿起警棍一顿胖揍，打得吴文北满地乱滚，特别是吃了亏的那两个，下手阴狠无比。把吴文北打昏过去几次才算解了气。醒来再一审问，这位盲流“招供”是北京中国科学院家属，父亲吴新谋。电话打到数学所，警察才知道抓错了。

数学所保卫科出面，拿着户口本和介绍信，到天津车站派出所把被专政得一瘸一拐的吴文北领回家。整个过程中，文北没做任何错事，唯一是两个便衣拿他时，他不该反抗。这也难说，捕快们又没穿官衣儿，他哪知道这些人是警察？文北因为面孔像外国人被当作异类歧视、无端挨抓挨打，倍感冤屈，对警察极端反感。火儿憋着肚子里，变着法儿向警察示威。先是把合作社成罐的果酱芝麻酱偷偷往家扛，打火机的火石100粒一袋，也抓几包。史铁生听了吴文北毫无缘由就差点被打残，心里不忿，嘴里冒出一句：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商店向公安局报案，专政机关打击重点放在没有户口的外地盲流身上，哪能想到是老老实实的“臭老九”儿子吴文北作案？警察干气猴儿，没辙。此时大批干部、市民和子女家属……逐步下放牛棚、“五七”干校或农村去“大有作为”了，宿舍人去楼空。天公作美。吴文北开始入室偷东西，多次得手。有一次，正在行动中，赶上主人回家，他和弟弟把主人打昏，撒丫子逃走。偷东西换成钱，到莫斯科餐厅或新侨饭店西餐厅吃炸猪排和黄油面包，到西单商场和王府井东风市场买冰激凌雪人吃，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1973年，我从陕北回京，向首都人民汇报“讲用”学毛著的经验体会，也应邀去品尝过一次。铁生接上一句，我也吃过，雪人确实好吃，可是一小杯几口就吃完，越吃越饿。而且忒贵，一个雪人的价钱在陕北农村能买好几天的口粮。我接着用吴文北的口吻，学他给我讲的一件趣事。一个学徒青工，硬着头皮装阔，约来女友表达浪漫爱情。冰激凌送上桌，雪人昂首挺胸、站在玻璃小盘里，一下黏住了女孩儿的两只眼球，天下竟有这么美的玩意儿，勺子拿在手里，不好意思下家伙。眼看雪人逐渐瘫软，马上要融化。那小年青儿说：别紧着看啦，快吃吧，要不待会儿该凉啦！……。

他当是吃炸酱面呐？不赶紧吃就凉啦！吴文北拿腔拿调模仿京片子，尾音拐弯儿，像小狗甩尾巴那么自然。我听了笑得直接想往地下摔。你看这小伙子，长一张外国脸，却说一口北京土话，中西合璧炉火纯青，全国罕有。吴文北后来发现，中国人家里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油水不大。剑走偏锋，偷到外交公寓的老外家中，造成恶劣国际影响。

1974年，吴文北、吴文中两兄弟终于被抓。正值文革天下大乱。乱世出重典，实行“严打”。案件以及法律程序沿袭“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批犯人从快、从重、从严处理。父亲吴新谋是国际知名的拓扑数学研究员，1951年回国以后，早就在各项运动中挺住了千锤百炼，政治思想统帅拓扑几何，要长就长，要方得方。听到消息后，立刻找到领导表态，孩子不是私有财产，坚决割断血脉亲情，完全交给无产阶级实行专政。法裔母亲听说两个亲爱的儿子被抓进监狱，还可能被“严打”判成死刑，骨肉情深，天当时就塌下来一半。神经接近错乱，二十年来，好容易学会几句中国话，一夜之间全部忘光。求告无门。情急之下，把先生工资买成大把邮票，整天不吃不喝，坐在家里给多年划清界限、不通音讯的法国亲戚写信求救。

吴文北的舅舅是法国在编将军，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任副总参谋长，找到总统蓬皮杜，总统认为吴文北出生在法国，理应保有法国国籍，亲自向中国政府为之求情，或免死，或引渡至法国。无果。

枪毙前几周，吴文北被五花大绑，在北京四处游街。执行死刑那天，海淀体育场的公审宣判大会上人山人海。有的看客见吴文北满脸横丝肉和壮疙瘩，说这小子的长相一看就不是好人；有的看了高鼻子和打着卷的褐色头发，说这罪犯长得果然像外国人，枪毙外国人实在解恨，谁让当年八国联军侵犯中国，国耻难忘。一致的声音是，没想到外国总统会放下身段，为一个可耻的罪犯向中国求情，领袖居然和草民心连心，可见资产阶级全是一丘之貉。放眼天下，谁敢蔑视大国总统的恳求？唯有中国！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真正伟大坚强。官方宣传义正词严，民间逻辑顺理成章。杀一儆百，枪毙吴文北的故事成为广大北京市民饭后谈资。铁生把这个故事听得入神，眼镜滑下来顾不上扶，被鼻头扛住。听我讲完枪毙过程，他推起眼镜叹一口气说，可惜了，这人如果不死，绝对是教外语的好材料，全中国难找。那时凌格风和英语九百句还没有在中国登场，青年人都在对着课本上的口型和国际音标学习外语，铁生正苦攻外语，准备当翻译。铁生又问，这人小时候怎么样？我回答说，吴文北小时候心地单纯，特别忠厚，我哥是活证人。文北小时候身体瘦，黄褐色头发，长的随法国母亲，脸上皮肉白得透明，点缀着雀斑，穿个背带裤，谁见了都想在脸上掐一把。长相奇特，孩子里没人跟他玩，死活要跟着小悦拜我哥当老大，诚心加入组织。我哥犯了周章，一来嫌他没本事，个子矮打起架来没用，二来长的像外国人，带出去显得队伍不够纯洁。他诚心诚意地要加入，争辩说他跑得快，让华光帮着说情。为了表现勇敢，张开手露出一只活动着翻卷身体的大肉虫子，是槐树上的青虫，俗名吊死鬼，当着大伙儿的面把活虫子放在嘴里，嚼吧几下就咽了，黑绿色的虫子水从嘴角淌出来。我哥和大伙儿一看，本事是真的，都被震住了，随后打成了一片成为好哥们儿。

我哥哥孙立博的回忆文章中写道：“幼年和少年的吴文北，诚实而重友情，乐观而开朗。文北走上了犯罪的道路，触犯了国家法律，应当受到法律的制裁。但他虽有伤人，没有命案；盗窃财物的总额也有限，罪不至死。然而，在文革期间，司法并不独立，法律为政治服务。文北盗窃，涉及了外国人，在文革期间给国家面子抹黑，就成为政治问题，被抓了典型，被从重从快，被全市游街，以至法国国家领导人出面说情，都没有能免一死，实是可悲可叹。后来文中被赦，放回法国，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他们的案子当时判重了”。

1978年，史铁生发表了小说《兄弟》，讲一个热血青年的犯罪故事，结尾写道：“枪毙于志强我看见了，可是没看太清楚。群众愤怒地喊口号，随即是一声枪响。记得身旁一个人幽默地说：‘怎么回事？他的血也是红的。’”每个人生下来一张白纸，青少年犯罪不是天生决定，必有多种社会环境因素。显然要多从制度和文化中寻找犯罪动因。改进制度，人类才有希望。人的血都是红的。

十

史铁生在红八月中侥幸逃脱了“黑五类”的厄运，心灵却在这三个月期间得到了一场暴风骤雨般的洗礼，得到了千载难逢的成长机会。他尝受了命运的百味莫辨和人生中偶然性的强大。

铁生一生当中大凡有了疑问，历来刨根问底钻死理，不弄明白不算完。这个素质使他不满足于表面正确的回答，他要寻找问题的本质，不断追问。首先，死去的姥爷为他的处境和未来带来了重大的不确定性。姥爷到底是个什么人？犯了什么死罪解放后被枪毙？他在记忆与印象中写道：“那年他让日本人抓了去，打得死去活来，这下大伙才知道他是个抗日的呀……”，“后来听说有人把他救了出去。没人知道去了哪儿。日本投降那年，有人说又看见他了，说他领着队伍进了城。我们跑到街上去看，可不是吗？他骑着高头大马跟几个军官走在队伍前头……”，“老人们早都说过，从小就看他是个人材，上学的时候门门功课都第一……可惜啦，他参加的是国民党，这国民党可把给他害了……”，“这个人呀，那可真是先知先觉！听说过他在村儿里办幼儿园的事吗？自己筹款弄了几间房，办幼儿园，办夜校，挨家挨户去请人家来上课，孩子们都去学唱歌，大人都得去识字，我还让他叫去给夜校讲过课呢……”这线索终于清楚，姥爷是个抗日的英雄，日本投降后退伍回乡担任国民党县党部书记，热心公益和教育做了许多好事，当地人民有口皆碑，显然是个好人。好人往往以为可以凭着良心活得坦坦荡荡：“快解放时他的大儿子从外头回来，劝他快走，先到别的地方躲躲，躲过这阵子再说，他不听嘛……他说我又没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共产党顺天意得民心那好嘛，我让位就是，可是你们记住，谁来了我也不跑。我为什么要跑？”

铁生的姥爷就是因为是跟着国民党的队伍而不是跟着共产党的队伍打日本，解放后遭到镇压。姥爷至死没弄明白，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政治哲学讲的是城邦利益。历史知道，与铁生姥爷命运相同的人恐怕不是一个两个人的事吧。

□ 节选自孙立哲：《想念史铁生》）

~~~~~

### 【不堪回首】

#### 抄家全过程

• 冯骥才 •

1966年夏天，空气里有种硝的气味并日渐浓烈，社会变得异样了。首先报纸成了战场，不时会有一个大人物被拉出来，立刻给种种凶烈的言辞打得人仰马翻。那时最出风头的笔杆子是姚文元，他是何人此前没听说过。我之所以看他的文章，是他的文笔特别，偶尔会用一点文学语言，还有一种能够决人生死的“权威”，这些别人都没有，仅此而已。我那时只是一个痴迷于绘画与文学的年轻人，更关注的是历史的经典，与现实政治距离很远，对批判的人物是谁都不很清楚，甚至完全不知道。比如三家村，只略知吴晗，对邓拓和廖沫沙就闻所未闻了。开始时只觉得社会这些异样的变化与个人关系不大，7月底还在劝业场二

楼的旧书店买到一部心仪已久的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天天捧在手里。可是8月初的一天，劝业场九路汽车站对面大墙贴了一份大字报，一连十来张，把一座四层楼的大墙都糊满了，挤了很多看，题目很新奇——《血统论》，据说是北京那边来人贴的。一看到里边那两句扎眼的话“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才感到一种阴冷的杀气吹到了我的身上。

高中毕业我报考中央美院初试通过，但复试被拒绝，理由是我的出身不好，由此我知道出身不好是我天生的“硬伤”，可是一直并没感到它对我有什么妨害，现在它找到我的头上来了。

著名的“8·18”后，社会空气突然紧张起来，好像马上要发生什么严重的事。23日晚饭后，我去女朋友顾同昭家。一进门就感觉她家气氛异样，不等我问，她母亲便说今天下午忽然拥进一群孩子，闯进各间房屋，跳到桌上和床上，撒欢儿一般乱蹦乱跳，狂喊狂叫，把屋里的东西乱扔，还把她父亲硬塞进一个空木箱里锁上，然后一哄而去。

她母亲披散着花白的头发，说话时眼睛瞪得圆圆，露出黑眼珠四边的眼白，显然下午的惊恐还在她心头。

我说：“你们没去派出所报案吗？怎么能随便闯进人家里呢！”

她家没人吭声。她家是个很本分的老实人家，没经过事，何况是这种不可思议的变故突然降临，完全不知道怎么招架。她父亲听说，五大道这边别的人家也闯进学生了，她家对面的两位名医金显宅和林崧的家都被破门而入，有的乱翻乱砸，有的说要搜查“变天账”，什么是变天账？我一时没想明白，却感到有些不安，安慰一下她父母便赶忙告辞回家。这时天已黑了，但街上似乎比平时要乱一些，远处有扩音器发出的咬牙切齿的宣讲声，在黑夜中听得很清晰。待到了大理道新忠厚里临街的一家门口，乱哄哄聚着一群人，楼上楼下所有灯都亮着，窗户里有急匆匆晃动的人影，还有叫喊声、喝斥声、砸玻璃、摔东西和猛烈的撞击声；没等我看清楚，只听有人说：“红卫兵抄家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抄家”两个字。

我自知出身不好，不敢多看，赶紧骑车回家。快到家时，几个年轻人坐在边道沿子上，可能是街坊家的孩子们，一个冲我说：“神气什么，到家门口看看去吧。”我没答话，往家里骑，很快就看到夜色中的家门口一片白花花，是大字报！我立刻紧张起来。

到近处看，大字报气势汹汹，写着要坚决揪出我父亲的大字标题，还有一连几张声称要打倒我这个狗崽子。怎么还会有我？我心慌成一团，字也看不成行，大概是说我醉心于“封资修”的画，还卖画——走资本主义道路。那时是全民所有制的公有经济，我所在的书画社是计件工资的集体所有制单位，现在上纲上线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令我惊愕的是，贴这张大字报的竟是我住在同一条街上的表姐。

我已经无法把这张大字报全看下来，赶紧进了家，跑到父母的房间一看，父母各坐在茶几两边的带扶手的椅子上不动，两张脸好像同一种的表情，都在鲜明地告诉我：要大难临头了。

我还发现屋中有些异样，光秃秃的，原来桌上摆放的东西都没有了。这时母亲叫我把屋子收拾一下，怕摔的瓷器全放进柜里，桌上的玻璃板放在桌子下边，好像是“坚壁清野”，防备即将到来的抄家，可是抄家是什么样的？谁都没经过，只是在《红楼梦》里看过。我们

仅仅靠着藏一藏怕摔怕砸的东西就能应付这种不得而知的抄家吗？看来我们对这场即将到来的社会灾难与时代疯狂太缺乏想象力了。

整个夜晚我是在一种破碎和慌乱的感觉中度过的，分不清是噩梦还是现实，反正无法挣脱。有时我分明听到呼喊叫杀之声，好像还有一队人马从我家的楼前呼啸而过——我不认为那是一种梦境。记得我曾爬起来把自己两本日记塞到暖气片后边，这写满了我近几年思想的日记叫我感到惶恐不安……可是我又觉得这些记忆有点像梦境，后来的事实却证明确有其事。平时半夜醒来总能听到父亲在隔壁那种刮大风一般的鼾声，可是这一夜没有，异样而出奇的静；这是由于我一直睡着没有听见，还是父亲和母亲一夜未曾合眼？我承认，那时的我，对父亲所知极少，对父亲的事也不感兴趣，只知道父亲年轻时是一个商人，开过面粉厂和贸易行，为此自己便先天和别无选择地出生在一个“剥削阶级的家庭”里。现在父亲要面对这个世界；我却不知道自己马上也要身陷在这个骤变得可怕的世界里。

第二天醒来，外边好像没有什么动静。然而骑车上街很快就发现天下大变，白纸黑字的大字报、大红标语、绿军装“哗哗”地跳进眼睛，被扬声器放大的凶猛的呼叫声和语录歌闯进耳朵。

在骑车经过三十四中学的时候，正赶上黑铁的大校门忽然从中打开，打里边拥出一大群穿绿衣、戴红袖章的学生，手里拿着亮晃晃的东西，飞快地占据街心。我停车下来，正想看看是怎么回事，忽见迎面一个学生手指着我喊着：“瞧，这个人是大背头。”一群红卫兵迅速上来把我围住，冲我喝问：“你是资产阶级大背头吗？”我说：“我头发一直很长。”学生们立即怒了，叫道：“还狡辩，老实点，给他铰了！”跟着学生们呼叫着拥上来，原来他们手中亮晃晃的东西都是剪子，有理发剪子，也有家里用的剪纸剪布的大剪子，跟着“咔嚓咔嚓”在我头上一通乱剪，我不敢乱动，怕他们的剪子捅破我的头，老老实实等他们剪完，又喝斥我一通，才放掉我。我看了他们一眼，他们个个脸上都洋溢着一种战斗胜利者的神气。后来我知道这是红卫兵扫四旧最早的行动——剪长头发和瘦腿裤，还有焚烧图书字画，砸一切老东西，伴之而来的就是抄家了。

我赶紧骑车赶往单位，同事们看到我乱糟糟的脑袋，再听我一说，都对时局的突变感到愕然和惴惴不安。同事们找来一把剪子帮我把头发修齐，由于头发被学生们铰得太苦，修好后短得接近光头了，他们还去商店给我买了一顶便帽戴上，虽然不像是平时的我，但这时已顾不上自己是什么模样了。

我那时工作的书画社在营口道上，“文革”一来，被上级集中到和平区文化馆后院一间空房里搞运动。学习文件、揭发坏人、写批判文章和大字报。文化馆四周的楼房民用的少，行政单位居多，平时很静，现在各个楼里好像都在打架，喊声愈来愈大。我有种不祥的感觉，为家里的母亲担心，渐渐感觉自己“咚、咚、咚”心跳得厉害，第一次觉得心脏和喘气都不舒服。临近中午时，有点坚持不住了，便去前院楼上找文化馆的吴主任，说我要请假回去看看。当时吴主任正在受单位群众的揭发批判，满院子的大字报都揭发他的种种罪行，但是他的姓名上边还没有打叉，表示还未被“拉下马”，还在管事。主任室的几扇玻璃窗上也糊着大字报，光线晦暗，他的脸色显得比纸还白，说话的声音几乎听不到。记得他对我说：“运动都有高潮，但不会总在高潮上，你要沉住气。”然后就准了我的假。他说的话却叫我懵懵懂懂听不明白；不知这话是对我说的，还是对他自己说的。

我急忙骑车穿过乱哄哄的街道。相比早晨上班时，气氛变得紧张和严肃了，一队队红卫兵手拿着木枪挺着胸膛走在街上，样子像去上阵杀敌；有的胡同口已经被封上了，有的人家已经开始了可怕的抄家。我家住在名为“五大道”的昔日租界里的居住区，老宅院多，遗老

遗少多，当然是抄家目标集中的地方。我不知自己的家和母亲现在如何，愈使劲蹬车，愈觉得双腿无力。在我从桂林路向右拐入我家居住的大理道时，隔着一百多米远，就见我家门口黑压压围着很大一群人，一直站到马路对面的边道上，都仰着脸朝我家那座楼看；我家的院墙上、各个窗口上、屋顶上都站满红卫兵，远看像《西游记》里的猴山。不用说，我家被抄了！

我家这座楼是三层。一层姓李，是天津昔日一位富商的后裔；二层是我家；三层是孙家，出身一个银行世家。可以说，我们整座楼的所有住户都是抄家的对象。此刻，红卫兵们正从窗口把室内各种东西稀里哗啦往下扔，发出不同的摔碎声；有一种旧藏的整匹的布料，被他们抓住布头从窗口扔下来，好像一道道长长的各色的瀑布由天而降，景象奇特，随之下边发出一片叫好声，上下呼应一片；一个站在三楼最顶上的红卫兵使劲地挥舞着红旗，好似占领了一个山头。

我知道此刻我回家去，不知会出什么事，但我不能逃避，我要去救助母亲。我把自行车推进桂林路一条胡同深处的隐蔽处藏好，然后奔往家中。奇怪的是，这时我反而不觉得心跳了。待到了家门口，耳听着有人叫了一声“狗崽子回来了”，眼前我的家已是一片狼藉。从各家抄出来的东西已经全混在一起。几个红卫兵上来用木枪拦住我，其中一个直问我：“你是谁？”我说：“我住在二楼，我回家。”这个红卫兵冷笑道：“家？你跟我进来。”

我跟在他的后边走进去，走廊到处堆着从屋里抄出来各种杂乱的东西，楼梯已经被这些东西埋在下边了，窗子的玻璃全是破碎的，我和他一边走，各种碎裂的声音一边从脚下发出来；几层楼上上下下站满手执木枪的红卫兵，那感觉使我脑袋忽然冒出电影《马门教授》抄家时的一个镜头。然而，在这样从未经历过的严峻的气氛里，我感觉自己身上竟然冒出一种自我的控制力，这种感觉使我自己有一点冷静。奇怪，这能力是哪来的？谁给我的？是因为父母和家中落难，只能由我挺身在前了？

上了二楼，我看到我的家像一片被炮猛烈轰击过的惨状。地面上全是衣服、碎瓷器、撕开的书、破玻璃板和歪歪扭扭的盆盆罐罐。所有柜子和箱子不是被打开，而是被刀斧劈开的，书桌的一角硬被斧头砍去，被打散的吊灯垂在屋顶中央，上边挂着母亲的一条长筒丝袜，这怪诞的印象十分清晰地留在我的“文革印象”里。墙上所有画都没了，涂抹着许多气势汹汹的标语。后院里不知在烧什么，浓浓的烟冒上来，使得站在屋外小阳台的红卫兵已变成人影。后来知道，我心爱的中外名著和书画都被扔下去，正在后院放火焚烧。走在我前边的红卫兵忽然扭过身来问我：“你有什么感觉？”

问这话的红卫兵大概是个头头，年岁略大一些，戴着一副窄黑边眼镜，可能是个高中生，比较沉稳，和那些年纪较小、冒冒失失、非常情绪化的学生不一样。他脸上没有表情，略略低着脑额，抬起一双细细的眼睛透过薄薄的眼镜片冷冷地盯着我。我说：“我家的一切都是父亲剥削来的。”

这红卫兵想了想说：“你能这么认识就好。现在是中午，我们去吃饭，可是马上就会回来。你们不准乱说乱动。”我点点头，感觉这个红卫兵比较能够说上话，便对他说：“我们决不会下楼。”从他的表情看，他满意我的回答。他盯着我的脸又说一句：“可不许藏东西。”说完便带着楼里的红卫兵撤了。

我赶紧去找母亲，急于知道她的处境，在她的卧室里找到她。她头发蓬乱，脸很脏，但她见到我时没有哭。母亲是个镇定的人。过去的几十年里，家庭每遇风浪，定海针不是父亲而是母亲。父亲只是做生意时胆大，出了事便胆小。此时，父亲没有下班，肯定在单位挨

斗，会遭遇到什么就全知道了。我和母亲先在废墟般的家里找到了一点昨天的剩饭剩菜，把肚子填饱；暖壶全被砸了，就打开自来水的水嘴，接些凉水喝。我小声问母亲：“您藏什么东西了吗？”母亲说：“有一盒首饰。”我一听就急了，说：“妈妈，快把东西交给我，一会儿由我上交。现在任何东西都不重要了，能活下来就行。”我当时比较清醒。我知道在那种突然的变故中唯一的选择是设法平安渡过这一劫难，这也是人的一种求生的本能。

没过多久，红卫兵就回来了，细一看，并不是刚才那拨人，而是换了一拨，头头也换了一个女的，十六七岁，身子瘦小，脸很白净，眉目清晰，人很厉害，一脸怒气，好像随时会发火；她腰上没系皮带，皮带攥在手里，一边上楼，一边用皮带“啪啪”使劲抽着楼梯两边的护板，气势很大。她上来就向我要“变天账”——这时我才明白，那时候放映的土改革命时期的电影中，常常会有一个老地主，偷藏房契地契账本之类，准备将来向农民反攻倒算，这些东西就叫做“变天账”。显然，此刻我们已被这些未通世事的年轻人当做假想敌了。我说我们家没有这种东西，她就火了，叫几个红卫兵把母亲弄到大街上“接受群众批斗”，然后翻箱倒柜抄找“变天账”。她本人在屋里走来走去，用脚掀动着地上乱七八糟的东西，忽然碰到几个厚厚的黑色的大本子，她拾起来问我：“这是什么？这不是变天账吗？”我吓了一跳，那时代我们对长辈的事情所知甚少，谁知家里的老东西都是些什么，真是些老账本吗？可是再一看就放心了，我说：“这是家里解放前的老照片、老相册。”

没想到“解放前”这三个字又把她惹火了。她喝斥我：“旧社会的照片留着想干吗，这不是怀念旧社会、想变天吗？”她边喝斥边翻看相册，随后脸上的表情就变了，露出阵阵冷笑。她问我照片上的人是谁？我说：“是我的母亲和姐姐。”母亲和姐姐们的老照片确实都很漂亮。只见这女红卫兵将相册上的照片一张张“刷、刷”地扯下来，然后撕得粉粉碎，扔掉，嘴里一边说着：“叫你们想变天！变天！变天！”

这时，母亲正在大街上遭受近乎戏谑的批斗。

从窗口望下去，母亲、一楼和三楼的几个女主人，横排一行跪在街上，被喝令赛跑，必须跪着“跑”，跑不动就爬。一群学生在四周连呼带喝。我发现邻居家的一些大大小小的男孩也参与进来，这些男孩平日就很淘气，有的很野，这会儿闹得更凶，时不时上去没头没脑地打一巴掌，我看到三楼的女主人孙大娘挨了很重一脚，在地上翻了两翻。我忙找那女红卫兵头头说：“红卫兵纪律严明，可是现在一些不知根底的人混在中间，万一别有用心，出了事就麻烦了，别给革命小将们抹黑。”没想到我的话真起了效力，她马上派人下去制止。我开始知道“政治智慧”的重要性。

忽然，一个红卫兵跑上来，与这个女红卫兵头头耳语，女红卫兵立即大声说：“我们有重要任务，立刻到楼下集合出发！”很快这拨红卫兵撤了。

我下楼去接母亲，母亲她们已被放回来，正上楼。前院浓烟滚滚，我担心起火，跑到院里一看，一些学生和邻居的孩子们在点火焚烧“四旧”，这中间有我的书，更多的是一楼李家的衣服与杂物。李家是天津巨贾李善人的后人，家用物品十分讲究，此时都在烈火中燃烧。我忽听烟火中有种挺怪的声音，透过浓烟看到李家的二妈披头散发在地上爬，好像寻找什么，火已经把她后背的衣服烧着，冒着很亮的火苗。我上去朝着她叫：“二妈，你在找什么？”她忽然反过身，仰卧地上，举手拿给我看，竟是她的假牙。原来刚刚她和我母亲在街上被批斗回来时，她的假牙掉了。她停下来找她的假牙。她的腿走不动了，只能爬。

就在这时一个学生冲上来把假牙夺走，训斥她：“你还想用假牙吃我们劳动人民的血肉吗？做梦！”一挥手把她的假牙摔得粉碎。他的行动引得站在院中和墙上的孩子们叫好。



有一句话热烘烘涌上了我的心头：“你们还有人性吗？”但我知道——我不能说，我不可能毁掉自己。我急中生智，弯下腰对二妈说：“你知道你犯下的罪恶吗？”二妈一直是个和善又自尊的老太太，可她竟像个乞丐傻呵呵地对我说：“我想吃捞面呵！”我发现她眼神有些涣散了，嘴张得圆圆，神情似笑非笑，有点滑稽和可怕。她周围和衣服上的火苗大了起来，她似乎感觉不到疼痛了；连惊带吓，烟熏火烧，她的神智已经不清，弄不好她会被烧死。此刻站在院墙上的孩子们都在笑，在喊，没人当回事。我必须马上救她。我朝她大喊一声：“吃捞面？叫你这资本家的寄生虫吃——”跟着转身跑进她家的厨房提来一桶水，大叫一声，“叫你吃！吃吧！”一桶水哗地搂头盖顶浇下去，全浇在她身上。一瞬间，我看到她本能地扬起胳膊挡水时可怜的样子，但这桶水把她身上的火全浇灭了。我就势弯腰把她抱起来，进了楼，放在走廊的地上。我的行动使得那些不懂事的孩子们叫好，真以为我教训了这个“阶级敌人”。在我抱着她湿淋淋、瘫软、冒着烧糊气味和汗臭的身子时，那感觉好像救起被车轱辘轧破肠子的一条狗。

二妈作为一个富家的遗孀，在她那个利害纠结的大家庭里身世十分可悲；我知道她的很多不幸，但现在没人管这些了。现在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暴力的行动”。

□ 节选自冯骥才：《无路可逃》

~~~~~  
【千秋功罪】

黄永胜晚年父子问答录

• 黄 正 •

◇ 黄永胜父子的对话：

子：你最好的上级是谁？

父：如果不算毛泽东，那就是罗帅了。还有一个是陶铸，在广东我们配合得很好，我很尊敬他。

子：为什么不是林彪呢？

父：林彪当然也是我最好的上级。可是，唉……（沉默很久）“他跑什么跑嘛！”

子：那领导你时间最长的上级呢？

父：林彪、罗荣桓，还有聂荣臻。罗荣桓还比林彪要长一些，从三湾改编后就是我的上级了，井冈山，一军团，115师，东北，中南军区……十几年……到解放差不多20年呢！

子：你对周恩来怎么评价？

父：搞外交他是一把好手，搞内政嘛……八级泥瓦匠。

子：他应该很有能力的呀！

父：就我亲眼看到的，周恩来在政治局简直就是一个受气的小媳妇。江青整他，他就是逆来顺受，一句都不敢反驳。有一次政治局会议刚开始，江青就闹，要总理解决她的马桶太凉，说一上厕所就感冒，一感冒就不能见主席，怕传染主席。她也会闹成大病。这个问题还不严重啊？周恩来说开完会我派人去看一看。江青不干，说总理对她没有阶级感情，阶级敌人盼着她快点死。周恩来没办法，停止政治局会议，全体成员到江青住的钓鱼台，去看那个

“凉”马桶。周恩来用手托着下巴，围着“凉”马桶左转右转，拿不出让“凉”马桶变“暖”的办法。最后周恩来说：江青同志，我们没有技术加热马桶的垫圈。你看这样好不好，我们用保暖的东西把垫圈包起来，外面再用软布包上，先临时解决一下？江青同意了，这才算完。政治局开会，阵线分明。一休息，我们抢先到服务部吃冷饮。如果江青、张春桥先去了服务部，我们就去喝茶。而周恩来哪里也不去，就坐在座位上，他双手往桌上一放打瞌睡。周恩来私下也诉苦，我同情他。我也看不惯江青，我就同江青吵。

子：爸爸那你怎么同江青吵呢？

父：办法可多了，冷嘲热讽，软磨硬顶。江青气得很！我到北京以前，杨成武对江青也是怕，一开会，从来没人敢顶她。我可不管，我是军人，她又不是我上级，我为什么一定要听她的？有一次，江青在会上提出来，要军委办事组同意把军艺那个大院给她的京剧样板团用。我就不表态。拖了一段，她就在会上说，军委办事组不支持文艺革命，不支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说我反对她，专门和她对着干。我也气了，但我不发火。我说好啊，你们在会上通过一个决议，下一个文件，要我们军队把军艺那些钢琴呀，乐器？呀，设备呀统统扔到街上去，把军艺的人和家属统统赶到街上，挨饿受冻都不管，也不用我们解放军负责，我马上就执行。江青同志你看好不好？江青气得说不出话来，也发不了火，脸都青了。下午，李作鹏对着我直竖大拇指，说还是我们组长行！要是我不顶住，军艺早就被扫地出门了。江青早就想把军艺给取消，说不定她就达到了目的。

子：还有呢？不是说你们几个人在九大上故意搞江青几个人选票的鬼？

父：他们不得人心嘛。选政治局委员时我说我就不投江青的票，办事组那几个听到后也不投她的票。选举结果一出来，结果江青少了好多票。江青阴着脸发狠说：要查出是谁敢不投她的票。后来被主席制止了。她对总理、对我们那么不客气，我也不客气（黄永胜露出笑容）！

子：好多人都怕江青，你为什么敢跟他顶？

父：我为什么要怕她？我是按主席的话做事，她总是另搞一套。这个人品质不好，讨人嫌！

子：那你总是顶撞江青，毛泽东是什么态度呢？

父：他还表扬我，说我讲的是对的，应该坚持原则，不吃江青那一套，好！

子：江青闹的那些事都是公开的，主席不可能不知道。我们看她就从毛那里得到了授意。毛公开对你们说的一个样，私下里另一个样。爸，你现在明白了？

父：那时我哪会想到这个事？这样看，主席当时对我们的好多表扬也要打个大大的问号了……（沉默）

……

子：现在都说，林彪喜欢你？

父：喜欢不敢说，我也不知道。但是从红军时他就很欣赏我打仗。第四次反“围剿”时林彪说过，作战的事情你交给黄永胜以后，就可以放心了。

子：毛泽东喜欢你吗？

父：以前是，后来……（黄永胜伸出右手，掌心向上，又手背向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子：我感觉，其实一开始毛泽东对爸爸你还是挺好的。

父：噢？你说说哪里好？

子：你看，林彪让你一开始代总长，他给坚决划掉。江青跟你闹，不让你出访阿尔巴尼亚，他制止了江青。你跟江青总在会上斗，他不是也说你斗得有道理？……他还要你当政治局常委，这可是天大的信任啊。

父：嗯，……他还是挺欣赏我的。去了北京一开始他对我很支持，很信任。可是后来慢慢不一样了。现在我觉得他还是坐在江青、张春桥那边更多一些。

子：他（毛泽东）说他不认识你，是不是因为这个呢？你当总长前他真的不认识你？

父：他不认识我？有的事我们两个心照不宣。认不认识我黄永胜，他知，我知。

……

子：听说爸爸你推荐过几个人还挺准的，是吗？

父：是啊，爸爸我推荐人还是不错的，林彪和周恩来都很重视我的眼光。我向林彪推荐让邱会作做总后勤部部长，向周恩来推荐过解放赵紫阳，还有让王猛做国家体委主任，还推荐过张才千和丁盛，结果都推荐得很准。周恩来文革中国务院无人用时，总来找我，后来周恩来那里一需要用人，就向军队要。军队给多了也吃不消，军队里也需要好的干部啊。我在办事组会议上发牢骚，说是总理再这样要人，军队也快没人用了。文化大革命中间，按那时的标准衡量，又要能干过硬，还要背景清楚，缺干部啊。

子：爸爸，你要是不到北京当总长，后来“九一三”你的事情就不会那么大，现在的处境也就不会这个样了吧？

父：那个总长是我愿意当的？是周恩来把我骗到北京去当的这个总长。他打电话来要我连夜上北京，说是讨论湖南革命委员会的人选问题。……结果在人民大会堂，他什么都不说，就把杨成武带出来，说“你的错误很严重，不能工作了，把你那一摊交给黄永胜。”当时我总不能当着杨成武的面说我不干。等把杨成武带走，我就说我干不了，要他们选别人。周恩来要我找林彪。……后来林彪拿出毛泽东的批示，说是御笔亲批的……看了后我就没话说了。军人总要服从命令。我总是跟江青干架，也是不想当这个总长，所以人家怕她我就不怕。

子：我听邱会作儿子说，“九一三”后总理还为你们打了保票，说没事了，你们好好工作，主席还是相信你们几个老将的。而且在你们被押走时，还说夫人、孩子你们放心，由他打保票，少了一根毫毛找他周恩来负责。文件上还说中央等了你们十天之久，你们是不是检讨了就没事了？

父：我才不信那些话呢！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国防部长跑了，总参谋长能脱得了干系？我在那个位置上，在劫难逃！这是检讨就能过关的事？

子：文件说你那十天就在烧文件，把一个缸都烧爆了？

父：我就是要烧，我不烧他们就放过我了？烧不烧都是一个样。主要是烧照片，也有一些文件。我看见林彪的照片我就来气，你好好的跑什么吗？你跑了，我们说得清楚吗？这一烧我才知道照片不好烧，火苗是绿的，烧一下就灭了。又要点火，我就用些纸的文件去再点照片，还是烧不透。只好来回烧，温度又高，就把那个缸烧裂了。我把与林彪、叶群的照片统统烧了，那里面不光有我，还有别的人跟林彪、叶群一起的合影，留下来，不知道照片上的那些人还会有什么麻烦！

子：爸爸，文件上说你们要搞武装政变？

父：我们不但没有搞，连想都没想过！

子：文件上说你们参与谋害毛主席呢！

父：那是笑话。我要谋害毛主席，机会太多了，容易得很！

子：还有南逃广州另立中央呢？

父：莫名其妙嘛！林立果那不是小孩子过家家吗？还要说跟我有联系？跟我有联系，就不会搞那么笑话的什么鬼东西（指五七一工程纪要）了。

子：听说人家不给贺龙吃饭，不给吃药，活活把一个元帅饿死了，是怎么回事，爸爸你知道吗？

父：我哪里会知道！我挂着二办（中央专案组第二办公室），二办只负责政治上审查，生活待遇安排是一办汪东兴负责的。给贺龙什么待遇，汪东兴最清楚，是他来决定执行的。彭德怀专案组、贺龙专案组都是周恩来负责。对彭德怀、贺龙，还有文化大革命，发明权、版权都不是我的。敢把所有人的批示都拿出来吗？打倒贺龙，我正在北京，那时我还是广州的司令员，萧华来找我，说要带我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我不想去，认为北京的事与我没什么太大关系。萧华说会议非常非常重要，你去了就知道了。我跟萧华一起去了西山，会议是元帅叶剑英主持的，讲打倒贺龙的事。元帅刘伯承作了长篇发言，讲贺龙是大军阀、大土匪，讲了好几个小时。这就给贺龙定了调子。我一个军区司令员怎么去打倒一个军委副主席，一个元帅？可能吗？笑话嘛！这个贺龙打倒了，你们几个儿子还在跟贺小龙他们几个一起玩。叶群给我打电话，要我把你们四个骗回广州，叶群还要你们写个检讨给中央文革，你们记得吗？要按我的意见，那个检讨根本不应该写。贺龙是怎么被打倒的，我都不明不白，你们更加不知道，这有什么好检讨的？但是叶群坚持，你们也只好听她的了！孩子，都说读书人讲气节，其实军人更讲气节。嘿……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不服气有什么办法？

子：爸爸，你这一辈子说过的最多的一句话是什么？

父：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子：你什么时候知道这句话的？

父：我一当兵，在武汉警卫团就知道了。1970年庐山会议，我在北京留守，毛泽东写了《我的一点意见》后，要我上山。我一到山上，什么人都不让我先见。没见林彪，直接去见毛泽东。我们谈话时，所有的人包括林彪都在等，等这个谈话有什么结果。毛泽东跟我谈了很长时间，最后要我表态，我就说了这句话——“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知道毛泽东不高兴了，他想听的不是这句话。

子：他想你怎么样？

父：他大概要我学谢富治。跟着江青后面跑……那不可能！

子：那你们都说了些什么？

父：现在不说了，没什么意义。

子：爸爸，像你这么说，毛泽东其实给了你机会，你听他的不就行了？他是领袖，听了他的也不算错。

父：他要是明说，我倒也会听令而行；但他又不明说，就是绕着弯让我猜。一会儿讲井冈山，一会儿讲几次路线斗争，一会儿又讲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性还有林副主席怎么好怎么好，中央文革哪里哪里不对，哪里哪里对。听话听声，锣鼓听音，我倒是猜了一点点，似是而非。可这个事是能靠猜来处理的吗？万一猜出问题是天大的事！儿子，军队是一个系统，军人必须服从军令。军人讲忠诚，讲服从，千古如此，共产党也一样。不然我们怎么打那么多胜仗？我要求下级也是坚决执行命令。你是军委主席，你要让我干什么，你给我一个命令，我就执行。但是，你要林彪当我的上级，你到处讲要我们听他的，你把他放在《党章》里，

我能不听他的？我是军人，你对他想怎么样，你对他不满意你拿掉他，我就不听他的了。就像罗瑞卿，你让他当总参谋长，我这个军区司令员能不听他的？他搞大比武，我也得搞大比武。你拿掉他了，谁当总长我不是得听谁的？杨成武挂了一个“代”字，我不也得听他的？何况林彪？讲穿了那就是屁股上的事。不过，要我跟在江青屁股后面来搞我的上级，搞周恩来这样的老资格，我死后还不得让人千夫所指！你要让江青领导我，好啊，你下命令，下指示。

子：你知道了毛泽东要搞林彪，你就听他的嘛。

父：他能让我听出来他要搞林彪？那不等于就是下指示了？他的话就是在江青、张春桥身上绕，这两个人又是最讨厌的。张春桥还是个叛徒，文件我们原先都看过，最后呈送到毛泽东那里。我就说主席，张春桥是个叛徒，你也知道，该怎么处理？请明示我。他不讲怎么办，又把话绕开。张春桥和江青是绑在一起的呀！你不给指示，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样才好。可是这种上层政治的事能够落在纸上吗？爸爸是个军人，军人搞政治，爸爸搞不来哟！

子：那后来林彪跑了……

父：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要跑？他这一跑，我们讲什么还有用吗？那个“三叉戟”，机组都不带全，怕是有个机场都下不来！还有什么谋害主席，武装政变，南逃广州，这些事不像林彪的性格，我是怎么也不明白。

子：爸爸，你写点回忆录吧。

父：写那个东西干什么？

子：留下来，把事情说清楚，也给后人留下些什么。

父：我不写，现在发表的那些回忆录，我看了一些，好多都是瞎扯！有些仗明明不是他打的，也说是他打的。有的战役他在外围很远的地方打牵制，也要说是他指挥的。鬼话嘛！我要写出来，跟这些人讲的不一样，人家信他还是信我？不了解历史的人你讲了他也不一定相信，了解历史的人你不讲他也知道怎么一回事。对不懂的人来说，我的讲法不过是很多种讲法中的一种而已。我从不凑那个热闹。

子：比如你打的那些仗，那总可以搞清楚的呀！

父：那些仗都有作战记录、作战电报，想弄？清楚很容易，一查，就可以清清楚楚。况且我现在看不到这些档案，我也讲不清楚。60年代，报纸上到处都是回忆录，回忆啊，歌颂啊，风光啊。很多人鼓励我也写个东西，我试着写了一篇《秋季攻势的序幕》，有这么一本，讲杨杖子战斗的详细过程，还拿出来征求意见。后来我想还是算了，笔墨？官司，文字上容易出问题，弄？不好得罪人，赶紧收回来烧了。仗打好了，胜利？了，不就行了？

子：那你写写文化大革命，将来总有搞清楚的一天。

父：文化大革命？老家的话讲，叫七门八路！我自己都不清楚是怎么回事，我怎么讲得清楚？（停了一下）党不让你清清楚楚，你自己就讲不清楚；要让你清清楚楚，你不讲也会叫人帮你写得清清楚楚。你写了，他不需要就没有用，等人家需要了发表出来，不过又是个政治需要。我们个人不写也罢！要留，我就留我在法庭上说的那两句诗：惟有赭衣供瘼病，不曾涓埃答人民。（过一会儿）我出来参军那时候，这个国家千疮百孔；秋收起义时，这个军队破破烂烂；我入党时，这个党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少地？对这个国家，这个党，这个军队，我无愧！我值了！……哪个庙里没有屈死的鬼哟！……电影《赛虎》你们看了吗？我看了很多感慨呢！说到底，狗，就是忠诚，主人有难，他不会离开主人。危险时，他就是拼了命也要保护主人。最后要死了，它都不会死在主人家里……（轻声地）爸爸我，是属狗的……

附 舒云的读书笔记：

1971年9月13日，黄永胜61岁的生日还没有到。

“九一三”后一星期左右，邱会作带大儿子邱路光到黄永胜家。黄永胜正在办公桌前批文件，他没有抬头，一边批一边说：胖子（邱路光），你黄伯伯我这是站好最后一班岗啊！他把邱路光支出去办了件事。邱路光回来，看见黄永胜站在“三北”防御态势图前，盯着图的某一点，久久沉默。

而他的父亲邱会作坐在椅子上，凝视着黄永胜的背影。黄永胜从来就没有把毛泽东和林彪分开过，林彪怎么跑了，为什么跑，他不知道。突然黄永胜拼尽全身力气，冲着“三北”地图大喊：“他妈的，跑什么跑！”黄永胜转过身，与邱会作久久对视。几乎同时，两位老战友放声大哭，持续了好长时间。然后两位老战友无奈地握了握手，从此告别。

“九一三”过后十天，黄吴李邱被骗到人民大会堂开会，被分别关押在北京卫戍区警卫三师的四个点上。黄永胜自信自己没有太大的过错。但万万没有想到，有人迫于专案组的压力，编造供词，承认了“两谋”。他们的“案子”越来越重，但黄永胜始终没有承认。粉碎“四人帮”后，本以为有了出头之日，没想到却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升了级。

十年后，到了1981年，审判“两案”。黄永胜没有请律师，他自己为自己辩护了三个小时。之后他被保外就医，安置青岛。

1983年4月26日18时17分，上将黄永胜病逝于青岛市人民医院，享年73岁。

□ 摘自黄正：《军人永胜》（香港新世纪出版社2010年版）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